

四十年来国民参政会研究综述

唐伯友 扶小兰

(重庆图书馆,重庆 400037;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41)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关于国民参政会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出版了部分档案文献,二是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资料整理方面,普通文献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但官方档案刊布明显滞后。学术研究方面,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背景、政治属性、组织机构、参政员遴选、职能职权等5个领域是主要研究对象,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在参政员群体、各类提案,以及国民参政会与战时国内各政治势力、与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国内外社会舆论互动、与陕甘宁边区议会关系等6个领域有所涉及,但研究明显不足;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驻会委员会和各专委会等机构,及其历届历次大会会议和各专委会会议等3个领域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关键词:国民参政会;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9)01-0017-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190102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由国民政府组织成立的全国最高咨询机构。它容纳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内的战时国内各政治势力,是战时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乎抗战大业的胜负成败,也与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息息相关。因此,国民参政会研究为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在国民参政会存续期间,就有学者开始整理相关文献,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以台湾地区及西方学者为主体的海外学界接续了上述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大陆学者为主体的国内外学界共同努力下,相关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及学术研究工作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文献整理及学术研究的肇始

抗战初期,时人已经开始着手搜集、整理散落于各类媒体上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信息、参政员提案及观感、新闻报道或社会舆论等文献资料,先后出版(发行)了以《国民参政会文献汇编》为代表的第一批文献汇编,并出版了以《国民参政会》为代表的第一批学术编著。此时,学人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国民参政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三个方面,研究结论也较为一致。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国民参政会是民

收稿日期:2018-12-05

作者简介:唐伯友(1972—),男,四川内江人,史学硕士,重庆图书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抗战大后方史;

扶小兰(1973—),女,四川内江人,史学硕士,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基金项目:2017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工程重点项目“抗战大后方专业媒体研究”(2017ZDKZ10);2017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工程重点项目“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媒体研究”(2017ZDKZ09)。

意机关,它通过行使建议、审议和调查等职权,对政府机构工作实施监督,以承担起集中各党派、各阶层以及各民族人士的力量和智慧,完成“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艰巨任务^{[1]4-10}。

抗战中后期,随着战时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各阶层、各政治团体的利益诉求分化。时人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解读或研究国民参政会;于是,各种迥异的学术观点或评价开始出现。例如该领域“海外研究第一人”潘维东,从政治学角度出发,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宪法体制演变过程的一个环节^[2],也有人认为它具有粉饰独裁统治工具的特征^{[3]3}。

上世纪50-70年代,以台北秦孝义、沈云龙和“党史馆”“国史馆”为代表的台湾学者及机构,利用其掌握官方档案的条件,有选择性地刊布了一批档案文件。其中,《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刊布的部分参政员讲话、提案、质询案等官方档案第一次进入普通学者的研究视野;而《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则是第一次系统刊布其下设机构的档案,其史料价值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以台北张玉法、马起华以及欧美 William L. Tung、徐乃力为代表的海外学者,主导着国民参政会的学术研究方向及话语权。他们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角度出发,对国民参政会的缘起、组织、职权、作用和参政员及若干建议方案等方向,做了部分叙述和初步分析后,有的认为它是“训政时期的一个临时咨询机构”^{[4]622},没有西方民主政体中议会或国会的特征;也有人认为它或多或少被国民党政府所主导,是国家的民意机关^[5]。这批学者规模不大,学术成果数量也非常有限,但是他们的学术观点却影响较为深远。

值得提及的是,70年代初,加拿大学者徐乃力完成了《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1937-1945)》(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and China's wartime problems,1937-1945)一书,这是西方学界关于国民参政会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在此领域最重要、最基础的学术成果。该著对国民参政会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做了较为清晰的叙述,第一次对若干提案、建议案做了局部梳理和初步论述。五年后,他在《中国战时议会:国民参政会(1938-1945)》(China's "Wartime parliament":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 1938-1945)一文中,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与作用,其观点长期为西方学界所重视。

二、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以大陆学者为主体的海内外史学界,较为系统地整理出版了相关档案文献,相关学术研究也全面开展起来。在此期间,学界出版了2套重要的专题资料汇编和3部学术专著,发表了132篇专论文章。

(一)专题文献整理及评价

以重庆学者为代表的大陆史学界,承担起相关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出版工作的重任,并取得了显著成就。

1984年,四川大学整理出版了《国民参政会资料》。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界第一部国民参政会专题文献资料,主要选编了组织条例、命令、函电、讲话、评论等文献资料,共计30余万字,具有开创性意义。但该文献只收录了中共参政员参加会议的相关资料,这是它的局限性之处。

1985-1987年,孟广涵、周永林等重庆学者整理出版《国民参政会纪实》。它分上、下册及续编3卷,近150万字,是一套采用纪实体例编撰而成的专题档案文献资料。该文献每卷刊布各有侧重,前两卷主要整理国内各大图书馆典藏的图书和报刊资料,以及大陆部分参政员日记、回忆录等口述史料,涵盖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和结束,以及4届13次会议期间的主体文献;《续编》主要刊布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主体的国内各大档案馆典藏的部分档案,包括各类文电、提案,以及国民参政会议长、副议长、秘书长等主要职官和583位参政员简历等。

《国民参政会纪实》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国民参政会产生、发展、演变和结束的历史过程;也客观地记录了国共两党、各中间党派、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在参政会中的活动及相互关系。它展示了历届

参政员及职官群体的基本面貌;也呈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度时艰的抗战精神,揭示战时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演变规律。

到目前为止,《国民参政会纪实》是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关于国民参政会最完整、最系统的专题档案文献汇编,也是研究相关问题所必须参考和倚重的文献之一,其影响极为深远。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部分重要档案文献未能收录进去。

(二)学术专著及评述

40年来,海峡两岸出版了3部学术专著。它们分别是蓝绸的《国民参政会对我国民主宪政的贡献》(台北黎明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周勇的《国民参政会》(重庆出版社,1995)和王凤青的《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其中,周著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其余2部属于专题性著作。

蓝著是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角度研究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背景、组织职能、预期目标,以及各党派、各团体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政治诉求,以及各参政员的民意表达和反馈,从而促进政治革新和民主化进程。作者的结论认为:国民参政会对中国民主宪政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王著则以黄炎培参政员在历届历次大会、驻会委员会会议,以及所属机构中的活动和提案为例,深入考察参政员们为坚持抗战,促进政治进步,关注国计民生,推动国家建设,维护国家统一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相较之下,周著则是海峡两岸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学术著作。该著以战时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变化为主线,把国民参政会划为前、中、后三个历史阶段,分别加以详细考察和评述,将其重要历史事件和发展脉络清晰地勾画出来,为后辈学者深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术指引。该书最大贡献或说成就在于明确界定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历史地、客观地分析了其历史作用,并实事求是地对其作了学术评价。

(三)学术论文及述评

40年来,以大陆学者为主体的国内外史学界,关于国民参政会的学术研究全面繁荣,学术成果较为丰硕,发表数以千计的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有130余篇专论(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足以表明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程度。上述成果集中研究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背景、性质、组织机构和历史作用,以及它与中共、与战时政治民主化、与各重要历史人物的关系等领域。

1. 历史背景研究

关于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历史背景,中外学者既有共同点,也有重大分歧。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国民参政会成立的大前提。但是,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却存在较大差异。有人认为“国防参议会”是国民参政会的雏形,是其产生的根源;也有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环节。

1987年,周永林在《论国民参政会》一文中首次明确指出:国民参政会直接源于“国防最高会议之国防参议会”,成为后来“国民参政会的胚胎”^{[6]2-3}。他在文中进一步阐述国共两党为适应民族抗战大局,促进政治民主进程,而捐弃前嫌,相忍为国,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促成了国民参政会的产生。这一论断的权威性和说服力,源于作者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客观公正的判断,至今仍是国内外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同时代的学者俞曙民、梁华栋进一步阐述道:国共两党的政策调整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居间斡旋直接促成了国民参政会^[7],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分不开^[8]。

近年来,有学者从长时段、宽视角的角度出发,将国民参政会置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语境中加以研究,在承认国共合作及抗日战争是大背景的前提下,提出了不同观点。如韩国学者柳镛泰认为“国民参政会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会议方式的继承,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而产生的”^[9]。章红也认为“不仅要将其置于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还要从整个民国史的角度对其进行

考察。”^[10]

2. 政治属性研究

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政治属性,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一般而言,台湾学者更倾向于继承战时观点,即认为它是战时中国类似于非常议会的民意机构;而大陆学者则普遍认为它是最高咨询机构。

1980年,台北学者马起华在《国民参政会——战时中央民意机构》一文中,开始对“战时民意机构论”有所质疑,提出“准中央民意机构”论或“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论。他的理由是,根据组织条例的规定,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仅限于咨询和建议,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国防会议;而且它的决议案因缺乏民意监督,导致流于形式。因此,他认为国民参政会“虽然略含民意机关的一点点的微微的曙光,但至多只是政府的一个顾问机关”^[11]。重庆学者周勇在其论著中提出并始终坚持“最高咨询机关”论。他认为,国民参政会是在抗战期间,由国民政府组织成立,由国共两党人士、爱国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代表构成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12]。这一论断长期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采信。

自上世纪90年代起,有部分大陆学者认为它具有“初步民意机构”性质。如学者从王世杰试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将国民参政建设成一个具有初步民意性质的机关,并逐步使之“获得立法权”^[13]的构想出发,来推导其“初步民意机构”的政治属性。进入20世纪后,有学者采用模糊概念和折中方式,给其定性为“咨议机关”^[14],或者具有准民意机关和咨议机关的双重性质^[15]。

鉴于上述观点的出现,周勇自2005年始连续在《光明日报》《探索》《重庆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从国民参政会产生历史背景、组织机构、职能职权、历史作用,以及它与各政党关系等维度,坚持认为“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16],并再次系统阐述这一论断的理由。

3. 职能职权研究

关于国民参政会的职能权限研究,学界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截至目前,大多数成果属于国民参政会的《组织条例》或《议事规则》等文件文本研究,而缺乏对具体职能和职权实现过程的实证研究,即对参政会职能机构运转和参政员工作以及其效能的研究不够,从而导致上述现象的出现。尽管如此,40年来,学界也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根据《组织条例》等相关文件的条文规定,国民参政会对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有建议权,对各级政府职能机构的工作有质询权,对中央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调查和初审权等职权。在上述职权中,吴海晶认为参政员在询问权上行使得最充分,成绩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参政员问鼎政治”的效果。^[17]章红也认为国民参政会“基本上克服了民国以来民治基础的薄弱性所带来的局限”^[10]。陈瑞云却认为“国民党对参政员行使职权做了种种限制”^[18],不利于其职权的实现。

近年来,王凤青在国民参政会制度设计、机构设置与运行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建树^[19]。中村元哉、波多野澄雄等日本学者,从制度设计角度研究国民参政会。他们认为国民参政会推动了中国法制建设;国民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都与国民参政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20]。

4. 历史作用研究

关于国民参政会的历史作用,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它既有进步性,又有局限性。其进步性是主体,主要体现在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民族团结,维护抗战大局、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等诸多方面。

周勇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宏观角度,对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在维护抗战大局方面,“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发挥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族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作用,在后期,国民参政会逐渐成为国民党鼓动内战,制造分裂的御用工具”^[21];在促进民主政治方面,成立国民参政会,意味着国民党在事实上已经承认了中共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并为他们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搭建了一个合法讲坛,“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契

机”“反映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是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一个阶梯”。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国民参政会“协助政府推进经济建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22]。

陈雷、陈闪认为国民参政会“推动和促进了战时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民主宪政意识,促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的本质”^[23]。王启华认为“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和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改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奠定了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基础”^[24]。刘俊杰认为它“不仅为多党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多党合作的形式奠定了基础”^[25]。

5. 与战时政治民主化关系研究

关于国民参政会与战时政治民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周勇认为与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和民初“民主政治”相比较而言,“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国民参政会的存在及其演变记录了中国政治民主化艰难前行的历程,在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上确有其重要的影响。”^[16]章红从战时政治民主发展的角度考察,则强调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政治民主的集中体现”^[10]。陈累认为国民参政会“直接推动和促进了1939年战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和高潮”^[26]。Fung, Edmund S. K 却认为国民参政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整体上仍是一次失败的民主实验^[27]。

6. 参政员研究

关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未来有较大拓展空间的领域。目前的学术成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参政员个体研究,一类是参政员群体研究。客观地说,参政员个体研究比群体研究要深入,成果也更突出。即便如此,个体研究成果还是集中在诸如陈嘉庚、黄炎培、董必武等部分著名参政员,研究视野尚需进一步扩大。

在参政员个体研究方面,周勇曾运用大量档案文献,详细考证陈嘉庚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日汉奸行为的电报提案,并厘清了这一重要史实^[28]。闻黎明考察了王世杰试图根据民主原则来完善或改造国民参政会,以推行民国政治制度改革,从而达到实践其政治理想的目的,最终惨遭失败的全过程。他的结论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与独裁专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13]。王凤青以极具代表性的黄炎培参政员为研究对象,集中考察其围绕国民参政会的主要政治活动和工作,尤其是以黄炎培的提案为中心,揭示他为挽救国家民族危难、民主建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她认为黄炎培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为抗战大局奔走呼号,对国共关系做了卓有成效的调解^[29]。王凤青还对参政员傅斯年做了初步研究。她认为“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的言行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面前对救国救民理想的不懈追求”^[30]。

苟翠屏认为参政员邓颖超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妇女自身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31]。张美凡认为参政员刘蘅静“提出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员收入、施行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制与国定制并行等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使更多的人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抗战建国的成功打下基础。”^[32]

在参政员群体研究方面,郭昭昭、宋青红等学者以女参政员群体为对象,研究这个特殊的群体的数量、年龄、职业以及提案关注方向等问题,认为她们的提案关注战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战争动员等各个方面,尤其关注妇女问题,包括妇女动员、争取和维护妇女自身权利等内容^[33],初步结论是“这个群体与延安的女性精英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爱国的信念彼此一致”^[34]。

7. 与中共及中间党派互动关系研究

40年来,关于国民参政会与中共及中间党派关系问题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学者们围绕中共及中间党派对国民参政会的政治诉求和相关参政员在会内的活动两大主题,做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影响也较为深远。

在国民参政会与中共关系问题上,学术界认识比较一致,都认为中共运用国民参政会合法讲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积极争取和国民党及民主党派的团结。周勇认为国民参政会是中共与国民党、中间党派合作或斗争的重要平台,它见证了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三种政治实力此消彼涨的发展轨迹。

一方面,中共积极推动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极力维护国民参政会的权威;另一方面,中共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一合法讲坛,拥护国民政府抗战方针,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既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又反对倒退摩擦,始终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35]⁶⁹。

李冬春等认为中共“为促成国民参政会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并通过国民参政会在国统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战事业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36]俞平认为中共“充分利用了国民参政会阵地,呼吁政治民主,广泛联合中间力量,揭露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为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37]。王启华从统战策略角度考察,认为“中共通过国民参政会维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牵制了国民党内部反动势力的分裂、倒退和投降”^[24]。

在国民参政会与中间党派互动关系问题上,周勇在全面深入分析各中间党派与国民参政会的互动关系后,认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工作重心和表现,在初期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国共两党一道,积极地为抗战大局献计献策;在中期支持中共“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策,维护中华民族抗战大局;在后期赞成中共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排挤进步人士,鼓动内战的倒行逆施^[21]。马学春、朱季康则重点分析了皖南事变后,中间党派与中共一起利用国民参政会合法平台,采取斗争而非妥协的策略,成功地挽救了第二次国共合作^[38]。孙明理以民盟与国民参政会的关系为例,认为国民参政会成为中间党派与国民政府直接对话的政治平台;一方面中间党派参政员得以发挥参政议政等职权;另一方面促进中间党派联合,进而使参政方式发生变化^[39]。

最近,郭呈才在《党的文献》发文认为,皖南事变发生后,中间党派倡议各党派委员会,希望借此协调解决国共矛盾;国民党方面企图改设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以凌驾各党派以统驭全国。中共与中间党派在共同应对上述阴谋和危机中,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合作^[40]。

8. 参政员提案研究

近年来,关于参政员提案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又一热点,尤其是对关系战时国计民生的提案,学者们给予比较高的关注度,也有一些成果出现。

王凤青在《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揭露孔祥熙贪污的议案》一文中,探讨了傅斯年“在抗战中后期提出了揭露孔祥熙贪污的几个议案。议案提出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孔祥熙被迫辞职。”^[41]孙宏年对国民参政会历届历次会议的涉藏提案作了初步整理和研究,他认为“这些议案涉及当时治藏问题的各个方面,虽然仅有一部分被采纳,但对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仍产生了重要影响”^[42]。

黄利新以有关华侨问题的提案为对象,研究参政员在不同阶段对华侨的关注焦点,从而分析他们对华侨统战思想的主要变化^[43]。黄利新还对涉及边疆、沦陷区、基层政治、社会救济等提案作了初步研究。他的结论是,国民党薄弱的基层统治是它在国共争雄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44]。陈国勇对财政经济提案做了初步研究,认为参政员针对战时财经问题提出大量缓减财政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提案,为有效动员全国人力物力,确保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反映出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执行不力、扰民严重的突出问题^[45]。

9. 与陕甘宁边区议会比较研究

1938年国民党决定在各省市设立参议会。在此背景下,中共也在陕甘宁边区设立参议会。但是,二者之间在组织机构、代表产生、职权范围等方面,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区别。关于国民参政会与陕甘宁边区议会的比较研究,学界的关注度很低,截止目前仅见周勇的两篇论文加以论述。

1988年,周勇从性质、作用、地位等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确认“国民参政会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都是抗战时期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抗日民主潮流的产物。”他指出,虽然两者具有相似之处,但却有很大差异;由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的方式产生,不仅体现了选举的普遍性和直接性,更体现了边区各阶级、各党派、各集团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

地位。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机关”，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6]229}。

1992年，周勇进一步指出：“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解放区参政会的实践看，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对政党制度、国家领导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为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12]

三、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的不足

(一) 文献整理不足

1. 缺乏对其它官方档案的搜集和整理

从资料来源地域看，目前搜集和利用的档案文献，绝大多数来自于以重庆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为代表的大陆典藏机构；而对于台北“国史馆”“党史馆”所典藏的官方档案刊布太少；对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等战时盟国的档案更是缺乏。

2. 缺乏影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从档案文献的类型看，已有的专题资料汇编几乎都是文字档案文献，缺乏影像文献，其成果形式也很单一，即出版书籍。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载体诸如图片、实物、音频、视频，甚至历史纪录片等非常规文献会大量涌现，也需要搜集和整理。

3. 缺乏文献信息的搜集和整理

从文献信息的系统性看，目前缺乏一部完整的文献信息索引工具书。已有专题资料汇编是以国民参政会历届历次大会及中共参会活动为主线，展开资料收集、整理和出版，很少涉及驻会委员会、所属机构以及参政员私人文书等文献信息。因此，系统搜集、整理和出版包括川康建设期成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经济动员策进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宪政期成会、军风纪调查团、延安视察团等机构的档案文献信息索引，更有利于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二) 学术研究不足

客观地说，经过40年辛勤的耕耘，学界对国民参政会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不仅出版（发表）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但是，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诸如综合研究不够系统、相关专题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1. 综合性学术研究不足

迄今为止，除了周勇的《国民参政会》一书，曾对国民参政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以外，学界尚未对国民参政会进行过全面系统地研究，也就没有综合研究成果推出。由于诸多因素限制，即便是被学界公认的《国民参政会》一书，也过于关注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表现，而对其他政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主张没有充分论述；也没有就国民参政会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发展的影响、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和运行等的理论性探索、制度性设计缺乏深入系统研究。

2. 参政员提案研究不足

在10年的存续期间，国民参政会召开了4届13次大会、100余次会议，共计提出2699个提案。但是，学界对提案和询问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尤其是没有一部系统研究国民参政会提案的专著，是非常遗憾的。

3. 各相关专门机构研究不足

截止目前，学界除了对川康建设期成会、华北慰劳视察团等少数国民参政会附属机构有初步研究外，对大多数下设专门委员会（机构）鲜有研究。尤其是对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驻会委员会、宪政期成会、经济动员策进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军风纪调查团、延安视察团等重点专门机构，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4. 会内各派政治势力研究不足

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国民参政会时,大多关注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合作与斗争,而对其他中间政治势力的政治主张及其影响、中间势力与国民参政会的互动及其影响的学术研究甚少,论述平平,因此大有研究的空间。

5. 对相关社会舆论研究不足

国民参政会是战时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重大事件,它涉及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因此,国内各阶层、各民族、各机构、各团体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美英等主要盟国,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和期待。他们纷纷发表意见、建议和评论,对国民参政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此,学界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领域进行研究。

6. 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关系的研究不足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反映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一个阶梯。因此,对国民参政会的研究,还需要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视角,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范予遂. 国民参政会[M]. 重庆:独立出版社,1938.
- [2] Pan Wei-tung.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 Study of Forty years of Constitution-making in China*[M].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45.
- [3] 评国民党参政会[M]. 莒南:山东新华书店,1945.
- [4] 张玉法. 中国现代史(下册)[M]. 台北:东华书局,1977.
- [5] William L. Tung.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Modern China*[M]. Martinus Nijhoff,1964.
- [6] 周永林等. 论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 [7] 俞曙民,孔庆泰. 论国民参政会的首次成立及其首届会议[J]. 历史档案,1988(2).
- [8] 梁华栋,孙远方. 论国民参政会初期的积极作用[J]. 东岳论丛,1988(4).
- [9] 柳镛泰. 从国民会议到国民参政会——职业代表制的持续与变化[J]. 南京大学学报,2006(3).
- [10] 章红. 国民参政会述论[J]. 抗日战争研究,1996(6).
- [11] 马起华. 国民参政会——战时中央民意机构[J]. 近代中国(台北),1980(19);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J]. 近代中国(台北),1983(35).
- [12] 周勇.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新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论纲[J].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1).
- [13] 闻黎明. 王世杰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4)[J]. 抗日战争研究,1993(6).
- [14] 薛恒. 国民参政会性质之辨[J]. 历史学研究,2003(4).
- [15] 吴海晶. 国民参政会若干问题探析[J].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3).
- [16] 周勇.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N]. 光明日报,2006-01-24.
- [17] 吴海晶. 国民参政会若干问题探析[J].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3).
- [18] 陈瑞云. 国民参政会述略[J]. 史学集刊,1984(4).
- [19] 王凤青. 国民参政会制度实际运行与设置初衷背离之原因[J]. 求索,2012(5).
- [20] 中村元哉. 战时中国的法制制定史[J]. 抗日战争研究,2014(2);波多野澄雄. 日本的日中战争史研究[J]. 抗日战争研究,2016(4).
- [21] 周勇. 国民参政会与中国各党派关系研究:1938—1948[J]. 重庆社会科学,2005(9).
- [22] 周勇. 论国民参政会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和作用[J]. 探索,2005(5).
- [23] 陈雷,陈闪. 试论国民参政会在战时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作用[J]. 历史档案,2005(2).
- [24] 王启华.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与中共统战策略[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5).
- [25] 刘俊杰.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是多党合作制的渊源[J].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08(4).
- [26] 陈累. 国民参政会与战时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J]. 贵州社会科学,2006(2).
- [27] Fung, Edmund S. K. *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ra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9-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8] 周勇. 陈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J]. 近代史研究, 1987(5).
- [29] 王凤青. 抗战前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J]. 抗日战争研究, 2008(2).
- [30] 王凤青. 论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以国民参政会为中心[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4).
- [31] 苟翠屏. 邓颖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1).
- [32] 张美凡. 抗战时期刘蘅静的教育观[J]. 改革与开放, 2016(12).
- [33] 宋青红. 抗战时期女参政员参与国民参政运动述论[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3(4).
- [34] 郭昭昭. 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的考察[J]. 安徽大学学报, 2006(6).
- [35] 周勇.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研究[M]//石岛纪之. 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36] 李冬春, 周保华. 中国共产党人与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J]. 山东社会科学, 1992(2).
- [37] 俞平. 新华日报利用国民参政会揭露和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述评[J]. 学理论, 2009(1).
- [38] 马学春, 朱季康. 以斗争挽救国共合作的出色范例[J]. 江西社会科学, 2003(7).
- [39] 孙明理. 民盟与国民参政会[D]. 西南大学, 2014.
- [40] 郭呈才. “各党派委员会”考论[J]. 党的文献, 2017(2).
- [41] 王凤青.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揭露孔祥熙贪污的议案[J]. 世纪桥, 2009(1).
- [42] 孙宏年. 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J]. 中国边疆史研究, 2002(3).
- [43] 黄利新.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员对海外华侨的统战思想[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3).
- [44] 黄利新.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参政会提案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 [45] 陈国勇.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财政经济提案研究[D]. 西南大学, 2011.
- [46] 周勇.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比较研究[C]//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National Political Assembly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Tang Boyou Fu Xiaolan

(Chongqing Library, Chongqing 400037;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Committee,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th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Assembly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arrangement and publication of archives and documents; the other is the publi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academic works. Up to now, relevant books, newspapers, journals, diaries, memoirs and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but the arrangement and publication of relevant official archives lags behind. Among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five direction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background, political attribute, organizations, selection and functions and powers, are the main subjects of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fields, and a relatively consistent conclusion has been formed. Besides, six directions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participants, various proposal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ional Political Assembly and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in wartime,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interaction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Shanxi – Gansu – Ningxia border region parliament are discussed, but obviously insufficient. And other three directions on organizations like the secretariat, the resident committee and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s of National Political Assembly, the previous session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s conference are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al research in reality.

Keywords: national political assembly; research; review

[责任编辑:左福生]